

文學與修養

吳宏一



聯經文學 ⑧4

文學與修養

吳宏一著

聯經文學④

文學與修養

79.04.1084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著 者 吳 宏 一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6425518・3620137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310-X

• 81034 •

目次

一

中國文學理論的回顧與前瞻	三
中國韻文源流	九
中國散文源流	二九
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居室建築	四九
中國文學面臨的兩個問題	五七
文學短論七篇	七五
作家座右銘	八七

二

孔子與論語 三

論語首章的內容與形式 九

弘揚倫理道德要多讀論語 一〇七

儒家傳統與道德實踐 一二

和現代青年談孝道 二七

發揚校園倫理 三三

治學與做人 三五

力行的重要 三九

提高氣質，恢宏氣度，培養氣概 一三三

文化建設的先決條件 一三七

中文字典淺說 一三九

附錄

《文學與修養》各篇發表年月 一四五

—

中國文學理論的回顧與前瞻

中國文學浩如烟海，就創作而言，種類繁多，成就可觀，不論是詩詞歌賦、古文駢體，或小說戲曲，無不名家輩出，爭奇鬥妍，而蔚為千彙萬狀的奇觀，誠如前人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就理論而言，淵遠而流長，日趨發達，無論是尚質或尚文，主應用或主純美，重內容或重形式，種種相反或調和的主張，也都曾見諸古人的評論中，愈演而愈盛。我們知道文學創作的發達，可以使批評者有更多的機會，對作品加以檢討比較，分析其得失利病，辨別其體製風格，從而歸納其原理方法，而有利於文學理論的建設；文學理論的發達，也可以使創作者知其利病，明其歸趨，得其指引，而有利於文學的創作、鑑賞和批評。因此，理論和創作的關係，正可互相推轂，互為影響，也因此，中國古代的

文學理論，對文學創作自有其一定的作用。像魏晉以後，文風趨向華麗藻飾，蕭統的《昭明文選》，便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為選文的標準，認為經書太尊，史書「褒貶是非，紀別異同」，子書「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都不算是「文」，因此把文學作品獨立在經史子之外。這種文學觀念，就影響了後世很多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者。同樣的，明朝前後七子像李夢陽、李攀龍等人，標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一時搦管操觚之士，便也「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對古人的作品字擬句比起來。由此足證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的密切關係。

講中國文學理論的人，尋源溯流，往往追溯到先秦古籍。像尚書詩言志、歌永言，孔子興觀群怨、思無邪，孟子以意逆志、論世知人等等的說法，便常被後人徵引。但這些說法，事實上只是片斷的話語，能否構成理論系統，尚成疑問。而且，他們所說的文學，兼有「文章」「博學」之意，並非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先秦這種混沌未開的文學觀念，經過兩漢魏晉的推衍討論，到了六朝，對文學才有比較明確的概念，使文學能慢慢脫離「學術」而獨自存在。當時有文筆之分，「文」指情感的純美的作品，「筆」指理智的實用的作品，跟現代的文學觀念，可說是相符合了。也從這個時期開始，文學理論才真正成立了體系。漢魏時代，揚雄、王充肯定了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曹丕開始注意到文體的分類，他

們都為文學理論奠定了基礎。有了此一基礎，六朝的文學理論才能蓬勃的發展起來。劉勰的《文心雕龍》，無異為中國文學理論樹立了一新里程碑；這本書共五十篇，前四篇說明他的基本觀點，以下各篇，論述各種文體的源流，品評歷代名家的得失，闡釋創作的過程和原理，討論批評的方法和標準，最後一篇則說明他寫作的動機和旨趣。全書綱目井然有序，見解正確周詳。他說：「文附質也」「質待文也」，主張形式內容並重，又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說明文學與時代環境的關係，涉及的文學層面，既深且廣，不愧是體大思精、傳誦千古的名著。其他如鍾嶸的《詩品》，品第名家作品，溯其源流，次其優劣；蕭統編的《昭明文選》，肯定沈思翰藻、形式優美的文章；顏之推等人則主張文學要切合實用，都為文學理論開闢了並行不悖的道路。隋唐以後，文學理論越趨發達，多能就理論本身加以討論，遂使文學評論（詩文評之類）於文學創作之外，別立一宗。唐宋以後的文學理論，不勝枚舉，但不管是鎔裁舊說或另創新義，都不外乎是在趨古或創新、尚文或尚質之間互為消長而已。「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這是自然的律則。不過，其中像唐宋大家的文論、嚴羽的《滄浪詩話》、前後七子的主張、桐城派的理論等等，都在文學史上發生過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要談中國文學理論，對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是不應忽視的。

一般說來，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有關詩文的批評多，有關小說戲劇的批評少，而且往往散見於詩文別集的序跋題贈中，詩話詞話又多內容蕪雜，欠系統化，有時只有三言兩語，難予讀者明確的印象。不過，在這傳統的文學理論中，固然有其缺失，但也有不少論著，足可開導後人心眼。劉勰的《文心雕龍》不談，像葉燮的《原詩》，系統嚴謹，層次井然，首尾相應，能立能破；像金聖歎選批的諸才子書，就作品本身加以分析鑑賞，都能金針度人，給讀者多所啟發；像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採用叔本華等人觀點，以境界論歷代詞家，也可予人登高望遠、一新耳目之感。從中我們又可知，即以今日文學理論的要求而言，傳統的文學評論也不乏可讀之作。像這些優良的傳統，我們應該加以發揚光大才對。

清朝中葉以來，西方文明挾船堅礮利以俱來，國人接觸的機會越來越多，西方文學理論的觀念和方法，也逐漸被國人所接受。固然，有些人應用西方文學理論到中國文學中，有過削足適履的弊病，但是西方文學理論的優點，像系統之嚴謹、態度之客觀、方法之縝密，都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因此，我們對它不僅不必排斥，而且需要接納。就像佛教傳入中國，最後和中國傳統文化融為一體一樣，我們希望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國文化也有水乳交融的一天。佛教的經典，曾經影響了不少的中國古代文學論著，我們也希望西方的文學理論，能給予現代或未來的中國文學，注入新血液，使之開創新機運。不過，要接納

西方文學理論，必須先充實自己中國固有的文化常識，注意我們的國情和民族性，不可一味「橫的移植」，強加套用，換句話說，必須要有正確的途徑。我們以為：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強求其同，不力求其異，應該是採納西方文學理論最正確的目標，也是最正確的方法。

如何結合優良的傳統和西方的長處，再創中國文學理論的新機運，是今日我們從事文化建設的一大課題。我們一方面要整理傳統的文獻資料，加以注釋、闡揚，一方面要接納西方的理論方法，多多譯介有關名著，來為中國文學再奠新基，再創新局，也唯有如此，才不愧是現代文學理論的工作者。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嘗言：「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這句話值得我們深思。

中國韻文源流

中國文學浩如煙海，想對它有一個完整而深入的認識，相當不容易；對於一般人來說，事實上也沒有這個必要。因此，我們在這裡想要介紹的，只是一些比較重要的基本常識而已。為了介紹方便，我們將中國文學大致分為韻文和散文兩大類。本篇先介紹韻文部分。

一、詩經

《詩經》原來只叫做「詩」，或「詩三百」，或「三百篇」。到了戰國晚年，才和《

易》、《書》、《禮》、《春秋》等被儒家尊稱為「經」。它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著成的年代，最早的詩篇大約在西周初年，最遲的已在春秋中葉。它包含著這段期間的民間歌謠、士大夫作品和祭祀的頌辭。全部有三一一篇，其中六篇只有篇名沒有詩，所以實際上只有三百零五篇。稱它為「詩三百」或「三百篇」，是取其整數來說的。

這三百零五篇中，除了極少數的篇章是現在湖北北部江漢一帶的作品以外，其餘各篇的地域，大約都在現在的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四省境內。所以它的絕大部分可以說是黃河流域所產生的北方文學。

三百篇在春秋時代是可以入樂的。當時通行賦詩的風氣，在外交的宴會裡，各國使臣往往要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願望、感謝、責難等等，大致都從詩篇裡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取其詩篇中的一兩句，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的暗示。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通行了，孔子卻將三百篇加以整理，用它來討論為學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來說的是治玉，將玉比人。他卻用來教導學生做學問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取其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有有畫，是一步一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

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後來才發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後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毛氏有二：一叫毛亨，人稱「大毛公」；一叫毛萇，人稱「小毛公」。）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思無邪」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的見解，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什麼時代作的，為什麼事作的。這種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地表現在詩序裡。

詩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總論，旨在說明詩的教化作用；小序每篇一條，旨在以史證詩。大序所說明的詩的教化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事實上這六義可分為兩組，風雅頌是說詩的性質，賦比興是說詩的作法。大序只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風刺、感化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教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樣都以音樂得名，風是風謠，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就是各國風土歌謠的意思；雅就是「夏」，有「正聲」的意思，是周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頌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種宗廟祭祀用的舞曲。在三百篇中，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十五國風，有詩一六〇篇；雅分大雅、

小雅，有詩一一一篇（其中有六篇，只有篇名沒有詩）；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有詩四〇篇。賦比興的意義，說法很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來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是鋪陳直敘的意思，比（拿這件事物來比方那件事物）興（從這件事物聯想到那件事物）則是大序所說的「主文而譎諫」；不直敘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戒自己。詩經裡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看法下，斷章取義或斷句取義的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端的叫做興。毛傳只在有興的地方標出；想來賦義是顯而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端，往往關係全詩，比較重要，所以便特別標出了。

詩經的作者絕大多數已不可考，能夠知道的，只有寥寥幾篇。詩中重疊複沓的地方很多，大概是古代樂工們在配樂演奏時，為了增加詠嘆的情調所改訂的。詩句雖然從二字一句到九字一句的句子都有，但卻以四字一句為主。這種四言詩，後代如曹操、嵇康、陶淵明等人，雖都曾努力地作過，但已如尾聲餘影，是難乎為繼的了。

詩經是中國人必讀的一部經典，它不但反映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那五百多年政治社會以及宗教思想的種種情況，而且，在文學史上，它也是後代一切純文學的鼻祖。因此，我們要談中國的韻文，就必須從它談起。